

会员通讯

2015年第11期

(总第55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6年2月4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 中国经济年会聚焦新常态展望“十三五” (2)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空中客车公司高级副总裁德培瑞 (4)
国经中心举办第七十八期经济每月谈 (5)

权威言论

- 曾培炎：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会暨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8)
曾培炎：在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上的致辞 (14)
曾培炎：在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18)
曾培炎：在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 (21)
魏礼群：以行政改革创新促经济转型升级 (24)
张晓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工作 (26)
聂振邦：“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29)
成果摘要 (49)
国际交流 (56)

[工作动态]

中国经济年会聚焦新常态展望“十三五”

12月2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在京召开。会议以“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为主题，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聚焦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管理和增长新动能，展开深入热烈讨论。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智库代表约300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明年全球经济将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贸易、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偏弱。国际油价下跌为全球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美元进入升息周期或将加剧输

入型通缩风险，新兴经济体结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多点突破与融合，成为世界经济正在孕育的发展新势能。

会议提出，我国当前正值“十三五”开局之时，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宏观调控的新路径。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关键指标，与GDP增长并重成为“双目标”体系。建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平衡的调控模式，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短板共存的状况。通过要素市场改革降低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和物流成本，选准补短板突破口，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从现有基础设施“硬投资”中，拨出相当比例投向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重视我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主动获取外部性红利。

年会期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召开会员大会暨理事会会议，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和会员单位代表出席。会议指出，中心要抓住创建国家高端智库的有利时机，完善运行机制，培养人才队伍，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中心工作，多出高质量研究建议，发挥资政启民作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空中客车公司 高级副总裁德培瑞

12月16日，中心执行局主任、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空中客车公司高级副总裁德培瑞等一行。交流部长许朝友、产业规划部副部长陈伟等陪同。



德培瑞表示，中国是空客最大的市场，空客寻求继续在华发展需要战略眼光。空客非常重视中国政府和航空公司的建议，希望获得更多的发展建议，以便更切合和满足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需求。

张晓强指出，空客对中国市场高度重视，天津已经成为中欧高技术合作成功的典范。中国制定“十三五”规划，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各国达成共

识，对高效、安全、清洁、低碳的运输功能有了更高的需求。目前中国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领导考虑中长期发展目标，会对中国企业包括民航业发展产生影响。中国空中运输市场和需求发展迅猛，这些都将为空客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希望空客抓住机遇，加强与中国开展深层技术合作，争取更大双赢结果。

双方还就航空市场发展、中国特色区域交通和机型设计等交换了意见。

国经中心举办第七十八期经济每月谈

2015年12月18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78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十三五’三农工作决战决胜”。会议由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主持。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分别发表演讲。



围绕建设现代农业问题，尹成杰指出，要坚持强化扶持导向，强化制度和政策创设，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包括推进农业发展理念的创新，强化完善和创新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调整和优化农业布局和结构，加快推进农村制度创新，加快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

关于“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心，聂振邦认为，第一，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工程作为工作重点，将边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地区人口作为重点扶贫对象。第二，深化完善区域性扶贫开发规划。第三，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第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五，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一批辐射带动贫困地区的骨干铁路、高速公路、水利枢纽、信息

工程等重大工程。第六，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俊才指出，今后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现代农业的安全性与经济性给予重视。一是政策调控要更加重视安全性与经济性的统一。二是更加重视规模化经营。三是更加重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更加重视政策调控的精准度，由过去的普惠为主改变为精准为主。

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会员单位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会暨 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5年12月26日)

尊敬的各位顾问，
各位理事及会员单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刚才张晓强同志代表中心汇报了2015年的主要工作，介绍了2016年的工作思路。我都同意。应该说，过去一年中心上下都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圆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交办的研究任务，做到尽心尽力，很多成果得到了部门的积极反响，有些已经落实到有关政策中。对外交流工作也取得新进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在座各位的支持，离不开各位顾问、各位理事及会员单位的帮助，也得益于中宣部、外交部、发改委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指导，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专程到中心调研并指导工作。中心还得到了基金董事会的支持，很多研究咨询任务的开展就是靠基金的资助。

中心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批准成立的，已经有七

年的历史了。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差不多花了四、五年的时间，中心主要是组建阶段，主要是打基础。当时没钱没房，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包括组织队伍、筹措资金、搭建架构、拓展业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应当说这是起步阶段。中心在参谋决策咨询方面发挥了作用，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在国内外获得了声誉。我想，从 2014 年中心换届到 2018 年，也就是现任理事会换届，再有四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是中心按照国家建设高端智库的要求，进一步夯实基础、创新机制、完善管理组织制度、工作上水平的阶段。2018 年以后，中心要真正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并进入世界一流水平智库行列。现在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要通过这四年的努力，创新和完善中心的组织运行机制，提高研究咨询质量，培养一批骨干人才队伍，为以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现在我国智库发展面临很好的形势。十八大之后，中央对智库发展非常重视。今年国家重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全国共有 25 家机构入选首批试点单位，国经中心作为两家社会智库之一，榜上有名。这是我们的光荣，也给我们提出了很高要求。中心应抓住机遇、奋发有为、不辱使命，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的期望和信任，打造出一批精品智库成果，在建设国家高端智库过程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下面，我结合明年中心的工作，谈谈创建高端智库建设的几点想法。

第一，重点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中心工作，多出高质量精品成果。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关

键一年，经济工作难度很大。譬如“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长新动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都是当前比较重大的课题，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充分发挥中心各位副理事长、常务理事、首席专家的作用，指导和领衔重大课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中心研究要内外有别。内部研讨要主动创新、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充分交流看法意见。只有通过思想碰撞才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对好的建议进行归纳，通过不同渠道及时上报。对外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研究成果。同时，要着眼基层实际，回应地方重大关切，做好调查研究，提供有效可行的咨询方案。

第二，注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扩大影响力。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压力也比较大，各种矛盾也比较多。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期，经济增长新动能在转换之中，下行压力较大、风险隐患增多。社会发展处于转型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敏感问题多发，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社会意识多样、多变，在信息社会里，小的问题可能通过“蝴蝶效应”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媒体对社会问题也有放大作用。智库应发挥“资政启民”的作用，解读好中央精神，宣传好国家政策，引导好社会预期，回应好各方关切。用好现有中国经济年会、经济每月谈等平台，加强研究交流和政策宣传工作。用好互联网站、社交 APP 等新型媒体，包括发行期刊等平面媒体，立体报道研究咨询成果，快速、及时、精准引导社会舆论，同时提高中心的社会信任度和知名度。

第三，拓展国际经济交流新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联性越来越强，既受外部世界影响，也在影响外部世界。中心是一家社会智库，社团性质的智库属于体制外，不吃皇粮，社会支持发展，不是政府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在国际上交流有独特的优势。但我们的宗旨和目标是明确的，根据国家和政府的战略需要开展工作。中心可以利用社会组织的民间身份，配合国家对外战略开展对外交往活动，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氛围，塑造我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双边层次上，充分利用中美二轨、中日二轨等已有平台，积极建设中欧二轨交流平台，积极开展与国外智库、社团特别是高端智库的交流，促进我与重点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多边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包括政策研讨交流。继续办好全球智库峰会平台、与 UNDP 合办可持续研讨会，同时争取申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参与 G20、“一带一路”等有关活动。在国际社会公众层次上，应做好对外宣传。转换话语体系，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办好英文网站，加强在国际媒体上的发声。现在有些人有顾虑，不愿意接收国际媒体采访，这不是长久之计。在国际平台上介绍中国发展成就，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效果应该更好。近期应重点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G20 中国年”、“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好宣传工作。

第四，建设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打造核心竞争力。打造世界一流智库，人才是关键。按照“一专多能”的素质要求，通过增加

投入和机制创新，不拘一格吸引人才，坚持能进能出，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加强培训磨练，全面提升综合能力，形成一批国内外叫得响的领军人才。设立多位不同领域的首席专家，配备专业人才，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实验室、研究所，创造各类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和空间。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形成争优创先的局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专家评价机制、奖励机制和淘汰机制。“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经济事务、擅长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开展双边智库合作，安排中心研究人员定期到国外智库做访问学者；同时聘请国外的知名人士到中心做访问学者，吸引国际青年才俊到中心做博士后。总之，建立起一套高效灵活的智库人才培养机制，为争创世界一流智库打好基础。

第五，进一步健全中心内部体制，完善智库组织管理模式。体制是决定智库高效运作的保障，一流智库需要一流体制。智库不能与行政机关一样。2014年中心换届后，结合中心的特点，形成了由理事会（理事长会）、学术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执行局组成的“三会一局”架构。在“三会”中老同志多、专家多，执行局下面的研究机构年轻人多。从运行一年多来的情况看，应当说这个架构还是比较科学和符合中心实际情况的，也符合体制的要求，既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能让老同志更多精力投入研究工作。国家重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意见里要求的组织架构与我们这个架构基本一致，说明中心在智库体制建设方面的探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下一步，中心应逐步完善，将来争取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起到示范作用。“三会一局”要根据国家重点高端智库建设要求，处理好各自定位与分工，发

挥优势，形成合力。理事会（理事长会）工作已经常态化，下一步应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学术委员会要重点围绕重大问题，及时提出选题，安排研究。咨询委员会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一些重大项目开展工作，可适当承接一些跨省域、关系国家重大战略的地方委托项目。执行局要为“三会”的工作做好保障工作，统筹协调，组织落实，有效运转。通过实践，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组织制度。

第六，加强会员单位参与度，扩大研究双向互动。中心是国家的智库、是社会的智库，也是会员的智库。要集中民智，反映民情，会员单位是重要渠道。中心会员单位都是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是各行业的领头羊。中心与会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联系，提高会员的参与度，建立经常性联系机制和活动平台。中心活动要多请会员参加，会员也要多关心中心发展，充分利用好智库资源。听取会员的意见和诉求，加强调研，对提出的问题应配合做好研究工作。

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际国内都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智库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智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中心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出谋划策，在创建国家高端智库、促进决策科学化的道路上迈上新台阶。

最后，借今天的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大家多年来对中心的支持！

在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上的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5年12月26日）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以“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年会。此时正值“十三五”开局之时，也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新理念下，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建言献策，汇集智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大势，一同描绘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蓝图，非常有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七年，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产出能力过剩、自由贸易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TFP）下滑等问题，使得全球复苏缓慢艰难，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而道远。发达国家处于危机以来较好状况。美国经济连续六个季度高于2%，但复苏的势头尚不稳固。日本、欧盟实现了较低速度的增长，但增长基础脆弱。新兴经济体集体放缓，中国、印度尚显稳定，俄罗斯、巴西处于衰退的边缘。

展望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呈现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偏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国际油价跌破40美元/桶，创下七年来新低，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靴子终于落地，美国从量化宽松周期转

向升息周期。但加息不会很顺利，将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输入性通缩风险加剧，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暴露，新兴经济体结构脆弱性或将进一步凸显。

当然，困顿、矛盾与风险并非对世界经济的“全景式勾勒”。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孕育着新的发展势能，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多点突破与融合，将推动改变发展模式，让创新从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项升级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选项，这一新趋势确实值得期待。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的大变动、大调整阶段。同样，身处其中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开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正经历着深刻变化。我认为，仅仅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的变革已远远不够。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发展的全局性特征，不仅仅表现为增长速度的变化，还包括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调整、政府行政行为变化、国民福利共享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

展望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十二五”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挑战更为严峻。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的新路径。特别是树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守住“底线思维”，准确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发展趋稳和蓄势。为此，我提出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讨论。

一是如何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问题。新常态需要新的宏

观调控框架和新的指标体系，突破经济增速目标的“硬约束”，改变经济刺激的“路径依赖”，必须摆脱“换挡焦虑”，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上来。未来可考虑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关键参考性指标，建立GDP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并重的“双目标”体系，跨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陷阱”，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破解“经济—资源—发展”的三角困局。

二是建立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平衡的调控模式。“十三五”应把握好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多重平衡。实践表明，总量调控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要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板的失衡，必须在总量需求与总量供给平衡的基础上，加大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平衡。着眼长远，将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总体目标中，促进短期宏观调控应与中长期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统筹约束目标的年度分解工作。在做好总量调控基础上，加强结构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预期调控，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三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与环境。以往的宏观经济管理大都偏重于产出端，而忽视了投入端。我认为，强调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比”，提高要素投入综合效率尤为重要。一方面，找准“补短板”的突破口，实施企业设备升级改造，大幅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进程，增加质优价廉产品供给，满足高质量、差别化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效降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中间环节。应当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与共享经济发展，加速各类生产要素

跨地域、跨部门自由流动，善用全球低成本、高质量要素，健全要素收入合理分配的机制，控制生产、流通、交易成本的过快上升。

四是全面加强对创新和软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十三五”最重要的是把创新真正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高效的和有助于潜在增益的投资。从人均资本存量看，中国目前只有美日的五分之一，未来还有很大空间。需要转变的是，原来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投资”，应拨出较大比例投向创新研发、人力资本、重大基础创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软投资”，全面蓄势启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五是主动获取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收益。当前，中国已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加入 SDR，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重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等重大战略举措，意味着中国已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 30%，中国结构性改革与国内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将会对全球和地区产生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未来中国需要在规则制定、政策沟通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收益。在国际合作中，不仅要支持国际发展，也要通过这种发展过程，获取合理收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施改革措施，包括人民币走出去等也要注意避免负的外部性。在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同时，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为获取我外部性红利做出更大努力。

“御政之首，革故鼎新。”改革开放攸关中国未来，结构调整路漫漫而修远。希望大家围绕本届年会主题碰撞智慧，提出真知灼见！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5年10月23日)

尊敬的保尔森主席，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本次会议将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关注点——“可持续性”作为主题，对中国实现经济转型、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与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借此机会，结合中国下一个五年的几项工作重点，简要谈谈我对中国可持续性行动的几个看法：

第一，可持续性应成为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中国虽然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面临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企业成本上升等诸多挑战，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必须转变发展的驱动模式，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方式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来予以推进。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雾霾和污水是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可以此为切入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这就需要大力推动节能减排，重塑行业相关标准，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倒逼企业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创新步伐，扩大清洁绿色生产模式，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统筹考虑服务业发展。这些都有利于城市经济转型，提升可持续性。

第二，扶贫开发应将可持续性作为重要指标。联合国已经为世界减贫工作议定了新目标。中国也正在制定新的扶贫工作计划。中国政府已明确承诺，未来五年内实现 7000 万人口脱贫，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扶贫开发也不能再走粗放扩张、消耗资源的老路，而应当将可持续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不仅要考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总量账，更要算付出的成本账、环境保护账。中国将积极探索落后地区扶贫开发的新模式，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力争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脱贫致富的良性循环。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15 年减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实践也将为 2015 年后的世界减贫提供宝贵经

验。

第三，京津冀应率先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实效。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应将可持续性作为推动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聚焦于生态环境共建共保，重点在交通、能源、产业布局、城市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相互协调，提高效率，力争在 2020 年实现该地区可持续性方面的重大改观。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中美两国加强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合作，应该有更多的共同兴趣点、经验传授和商业机会。希望各位嘉宾能够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畅所欲言，为推动可持续性的经济转型献计献策。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谢谢！

在可持续城镇化 CEO 理事会 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5 年 10 月 22 日)

尊敬的保尔森主席，
各位理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可持续城镇化 CEO 理事会”第二届年会。过去的一年，按照第一届年会确定的 2015 年工作目标，中美两国的企业围绕建筑节能和能源效率两个领域开展合作，理事会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顺利完成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将促进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访美期间，他在西雅图召开的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指出，在生态建设方面，“中国有需要、有市场，美国有技术、有经验”，“两国地方环保领域交流合作理应成为中美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此背景下，这次年会将深入探讨推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 55%，2020 年的目标是提高到 60%。这远低于美国的水平，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今后，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否

则付出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将无法承受。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希望能更多地与中国分享。我相信，保尔森主席倡导成立的这个理事会，必将在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明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召开的第五届“未来城市：现代中国城市可持续性研讨会”也将围绕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借此机会，我就明年理事会的工作谈几点个人看法，供各位参考：

一是继续推动示范项目。过去一年，理事会的企业家朋友们携手开展了两项工作：一个是北京海淀区的苏家陀保障房项目，它是由中国建筑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共同推进的示范项目；另一个是由一家美国公司制作的“绿大象”项目，该项目对中国的TCL、阿里巴巴等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制作成光盘加以推广。上述两个项目，很好地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来，对增强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具有示范的意义。未来一年要更好地总结经验，更大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并推广应用。

二是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合作。中国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期。这个期间，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使用效率低的问题还会困扰着中国，无论是雾霾，还是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都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每年都将是1000多万人进入城市，产生巨大的建筑、交通和物流等需求，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来降低污染物排放并提高能源效率，那么，我们未来所生活的城市将会更美好。应该说，中美两国企业在这些

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三是为城市建设提供投融资方案。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公私合营的 PPP 模式或者 BOT 模式，城市交通、水务和垃圾处理、停车场等公共服务和设施将更多地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这不是一项临时性措施，而是一项长久战略，目的是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质量，让更多具有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公司进入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海绵城市、城市地下管廊等，而对这种投融资模式，我们虽有一些个别成功的案例，但缺乏经验和规则，应多吸收外来的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

21 世纪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既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同时也是具有广阔市场空间的一个领域。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环境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将成为这块压舱石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考察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建设生态文明，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不仅仅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法律予以护航，还需要在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等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为城市提供更加绿色低碳的能源、交通、建筑、水和供应链，这也正是我们 CEO 理事会确定并关注的五大领域。希望大家在这次年会上贡献智慧。

最后，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以行政改革创新促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魏礼群

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然而，各国国情不同，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做法与路径也不相同。我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近两年，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鲜明特点是，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加快市场化进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向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实现更高形态、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政府一手抓简政放权，着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手抓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努力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发力、协调发力。通过实施这一系列举措，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成效，也积累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期，结构调整正值阵痛期，动力转换仍在过渡期。当前，必须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继续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释放更多红利、开拓更大空间。

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坚决把该“放”

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为进一步打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空间，国务院决定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年底前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此类事项原则上全部取消。同时，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从 2018 年起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管理从自贸区扩展到全国、从外资扩展到内资，将有助于破除束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加快市场开放，特别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改革，扩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将一些重要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固定下来，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以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应继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并动员公众、媒体等参与监督，形成“大监管”合力。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格局。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特别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消费市场监管，推动建立服务业监管标准，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应

继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总量和结构调控结合”“近期和长远调控结合”“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结合”等，及时完善调控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实效性。近期，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和公共产品投资力度，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落地。实施更有力的产业政策、国土政策，并使各项政策工具协同发挥作用。着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的国际协调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我国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外部环境。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日）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工作 ——在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上的讲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2015年12月26日）

今年9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十方面任务。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加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五中全会“建议”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开放等五大发展理念，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开放工作提出了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六方面任务。根据上述精神，我想重点谈一下“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这也是“构建新体制”、“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新举措。具体讲三点：第一，这是适应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开拓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资源全球优化配置。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多种工业产品发展居世界之首，若干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包括钢铁、建材、光伏发电设备等。同时，我们具有工程技术、性价比、建设工期等方面比较优势。例如，我们不仅是火电装机世界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火电煤耗和排放最低的 60 万、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也是我国自己干成的。又如 10 月 19 日，中方与印尼签署了长度 150 公里的雅万高铁协议，在竞标过程中，日本方面曾提出，中方承诺 3 年建成是吹牛。我们告诉各方，全长 1300 多公里的京沪高铁，我们只用了 3 年半就优质建成了！

第二，这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快速发展。通过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可以使资金、工程建设与设备产能有机结合，更充分发挥综合竞争力。例如，我国

铁路、港口、公路的建设能力与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但在一段时间内，很多工程公司在“走出去”时单一的强调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能力，但对投融资、建成后可持续运营则重视不够。对外先草签了工程承包合同，然后倒逼国内有关部门去协调解决投融资来源。今后，则要积极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设备制造等多方式合作，使我国“走出去”迈上新台阶。

第三，这是深化我国与多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有效措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体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巨大需求，但也更重视本国产业水平提升，资源本地深加工和增加本国就业。推进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为主要方向，并将更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为当地发展创造更良好的基础，切实体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深化南南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包括法、英、美等发达国家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架构，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例如，中法已签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在今年9月第七轮中美“二轨”对话举行前，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美方代表，对发展双边经济关系，他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投资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等重点，美方代表反映很积极。这样干，既可以缓解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拼力竞争的局面，向着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方向发展，也能为推进南北合作拓宽空间。

开展国际产能与设备合作刚刚起步，要有效实施还要下大功夫。例如，政府的引导服务水平需要提高，对外合作的机制与管理体制

需要进一步改革，一些企业存在盲目性、一哄而起，有的企业对尊重当地文化、宗教、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等不重视，存在着无序和恶性竞争的个别现象。这需要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的原则。通过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使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健康发展，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支柱。

“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聂振邦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群众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在扶贫标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 2 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很多贫困人口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我国扶贫事业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胜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任务依然繁重，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庞大，扶贫脱贫难度越来愈大，我国扶贫工作也出现一些新转变、新特点和新要求，同时面临新挑战。因此，“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要适应新形势、采取新思路、运用新机制、激发新动力，完成扶贫攻坚重大任务，促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一、“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基础和新形势

(一) 当前扶贫开发的进展情况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巨大。2011 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到 2014 年底，按照人均纯收入 2300 元 / 年的新扶贫标准的减贫总量达到 955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7.2% 下降到 7.2%，重点贫困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 3985 元提高到 6610 元，增速超过全国水平。根据 2013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统计，1980 年到 2008 年，中国减少 1.25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达 6.62 亿，扶贫减贫成效非常显著。

扶贫开发投入逐年加大。2014 年我国专项扶贫预算 433 亿元，2015 年 467 亿元，加上定点扶贫资金 300 亿元，财政直接投入达 700 多亿元。据 2015 年财政部预算，地方（省市县三级）的扶贫投入总计 1000 亿元。国家惠农政策总量达到每年 1.2 万亿元以上，年增量在 1000 亿元以上。

精准扶贫重点工作进展顺利。当前，精准扶贫基本实现干部驻村帮扶全覆盖，持续开展“雨露计划”等教育扶贫工程，创新小额信贷模式，推进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探索整村推进、土地整治、股份合作等新模式；“建档立卡”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金融服务、社会扶贫、精准扶贫等机制得到创新和完善。

片区扶贫工作取得较大进展。自 2011 年开始片区扶贫规划以来，预计“十二五”期末，交通、水利、能源等跨县重大扶贫项目

开工率可达 80%，完工率可达 40%。2011—2013 年，片区减贫幅度由此前慢于全国 3.1 个百分点，提高到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1.6 个百分点；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3 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年均增幅 13.5%，高于全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

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加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统计，2002 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 3:1 以上，2014 年首次下降到 2.92:1，但是绝对差距从 2001 年 4494 元上升到 18952 元，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从农村内部看，2000 年农村内部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 6.5 倍，2014 年扩大到 8.65 倍，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另外，2014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69，但在边疆贫困地区基尼系数较高，2014 年西藏农村达到 0.65，基尼系数的提高将使得贫困发生率上升。可见，目前我国已进入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的阶段。

（二）当前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庞大，扶贫减贫难度加大。一方面，按照 2300 元年收入 2010 年不变价的国家扶贫标准，到 2014 年底，我国依然有 7017 万人低于此项标准，贫困发生率为 7.2%，扶贫对象的规模庞大，扶贫工作依然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贫幅度出现明显下降，2010—2014 年减贫幅度从 26.1% 下降到 14.9%，减少了 11.2%，减贫幅度下降的非常明显，按照目前趋势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减贫步伐将会减缓。

扶贫不精准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贫困人口识别难。受到农村资产信息和家庭统计不健全、指标限制及人为操控等原因，导致贫困户难选错选问题普遍存在。二是扶贫资金不到位。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数据，在其对 2009—2012 年贫困人口的“赤贫”、“一般贫困”、“边缘贫困”和“稳健脱贫”四个分组中，前三组收入增长率非常低，“赤贫”和“边缘贫困”组甚至为负增长，而低收入农村贫困人口获得的低保、医疗报销和扶贫资金也最少，说明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实际上得到补助最少。三是地方建设未能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有些地方热衷于上大项目，偏好于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特别是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力度不够，未能实现将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机结合。四是贫困人口返贫问题重视不够。据中科院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组对 124 个贫困村调查数据测算发现，近 3 年来贫困返贫率 12.9%，六盘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和秦巴山区返贫率分别高达 53.7%、36.7% 和 29.5%；山西、甘肃、河北返贫率分别到 67.2%、53.7% 和 35.7%，缺乏对扶贫人口的动态跟踪和返贫人口再入机制。

扶贫开发与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不衔接。一方面，“片区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不衔接。由于“片区规划”编制时各省区“十二五”规划均已编制完成，致使“片区规划”部分建设项目落实难度大，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大主体责权不明晰，协同程度不高，造成扶贫项目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执行难度较大，难以落实等问题。另一方面，扶贫规划与当前国家重大区域性战略存在结合不紧密、不衔接，未能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区

域发展不平衡，特困地区发展滞后。

基层扶贫机构不健全，扶贫治理机制亟待完善。一是基层机构不健全。目前，扶贫组织人员呈现“上级队伍强，下面队伍弱”局面，特别是乡、村两级缺乏专职、稳定的扶贫队伍，多数地区只有扶贫办一家机构具体负责扶贫工作，工作效能和协调力度较弱，缺乏政府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造成扶贫效率较低，扶贫政策执行不到位等情况。二是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组织型、管制型扶贫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当前，政府行政参与过多、制度化评估问责制不完善及扶贫市场机制缺失，导致扶贫资源难以整合且在传递过程中内耗较大，扶贫作用减弱，政府扶贫管理创新仍需加强。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新形势

扶贫开发战略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经历改革经济体制方式减贫、开发式扶贫、攻坚式扶贫到 2010 年的基本贫困消除，2011 年进入同步小康发展扶贫阶段，扶贫目标由原来“保生存”向“保生态、促发展、惠民生”转变；扶贫模式亦由救济式扶贫、普惠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竞争式扶贫转变；扶贫区域也由单个行政区划转向跨行政区划的连片扶贫开发；扶贫工作总体呈现由“关注政策扶贫效果的国家导向”逐步朝着“注重外部环境改善的区域导向”直至“关注区域与贫困人口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导向”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提出新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结构调整、产能压缩等将直接导致农村贫困人口就业收入增长难，减贫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减缓，地方财

政收入增速也会放缓，即使不降低政府财政扶贫资金，参与扶贫的企业、社会等组织的扶贫投入也可能降低。另外，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差距加大、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等问题也对扶贫减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未来亟需构建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农村贫困出现新特点。据《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研究成果显示，新时期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贫困结构复杂，致贫原因多样，并呈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静态贫困到动态贫困、短期贫困到中长期贫困的新特点；需更加注重扶贫对象的需求，要准确把握致贫因素与扶贫对象发展意愿，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有效扶贫。

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在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等扶贫开发文件精神和总体要求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6 月提出的“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的要求，深入开展下一步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实现扶贫开发总目标。遵循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结合”的基本方针：把片区攻坚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把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把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结合起来。

扶贫开发需要新机制。根据 201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的深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各地需要在中央统一

部署下，在贫困县考核、精准扶贫、帮扶机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金融服务、社会参与等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以满足新时期扶贫工作开发工作的要求。

精准扶贫具备新手段。积极推进精准扶贫实施十大工程，包括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这十大工程将为精准扶贫奠定基础。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数据挖掘技术等新型技术手段为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提供的技术支撑，构建精准化、智慧化、动态化的精准扶贫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效率和质量。

二、“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思路、原则和目标

（一）“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

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即将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以及党政主要领导对扶贫工作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科学引领、扎实推进、精准施策，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在扶贫对象、扶贫方式和扶贫资源等方面精准发力；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扶贫开发格局；对不同地区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理清扶贫攻坚工作的发展思路和重点；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推广普及科技扶贫和智力支持，提高和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扶

贫开发工作体制机制，挖掘和释放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潜力；确保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

（二）“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宏观政策引导作用，同时加大政府财政扶贫力度；要发挥社会各界的组织作用，创新社会参与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扶贫攻坚工作格局。

突出重点，精准扶贫。要注重“三最”，即最困难地区、最困难人口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及其致贫原因，运用科学有效方法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做到政策精准、目标精准、责任精准、措施精准、监督精准、效果精准。

统筹资源，形成合力。要整合扶贫办及其他政府部门资源，也要整合政府、各类社会机构和市场资源；整合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各类扶贫资源的一体化；要强调财政、信贷、社会各方面的投入，把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全部动员整合起来；要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和各行业各系统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

简政放权，强化监督。中央和地方根据贫困因素进行工作分工、划分事权、明确责任，按照宏观的、群体的、生态型的、跨区域性的贫困，由中央统一协调管理，微观的、个体的、当地性的贫困，由地方政府负责。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加大中央和省市、社会第

三方机构对地方扶贫工作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群众参与，完善机制。要高度重视和尊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意愿，使得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中充分行使知情权、主动权、选择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增强贫困人口脱贫的信心，引导贫困人口积极参与，从由上到下的被动式脱贫逐步向由下到上的主动式脱贫转变，激发和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持续动力。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总目标

坚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总目标，总体上完成“两不愁、三保障”减贫目标，即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确保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脱贫；在完成总目标的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水平，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人均收入增长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和相对贫困扩大趋势，最终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三、“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工作

（一）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

将边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人口作为重点扶贫对象，其中应以14个连片特困区和其他重点县和贫困村为重中之重，在这些地区集中实施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统筹做好整村推进、就业促进、产业扶贫、移民搬迁、

定点扶贫等重点工作，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程。

（二）深化完善区域性扶贫开发规划

加快深化完善区域性扶贫开发规划，将扶贫规划纳入国家和地区“十三五”经济社会总体规划、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一是加快编制和调整贫困地区发展规划。指导贫困地区谋划一批“十三五”重大工程项目，组织编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升级实施规划，并积极将其纳入相关“十三五”行业专项规划。二是落实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加大扶贫力度。加快落实陕甘宁、赣闽粤、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全面贯彻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意见，研究出台并认真落实“十三五”扶贫开发超常规政策举措。三是以国家区域战略带动贫困地区发展。引导贫困地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和打造区域合作平台，引导相关发达地区产业优先向贫困地区转移，通过实施区域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三）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一是要完善建档立卡的制度性框架平台，精准识别贫困群体，精准分析致贫原因，精准制定帮扶措施；二是要实施精准化的分类级差管理，在建档立卡制度框架下，以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为基础，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标准，对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进行贫困程度分级分类管理，实行重点扶持、整体推进；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法、因户施策的扶贫方针，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救济扶贫为主，全部由农村低保养起来；

四是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采用小额贷款，发展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或采取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五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可采用生态移民扶贫措施实现精准施策。

（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既要坚持“输血”的必要条件，又要构建“造血”的功能，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持续内生动力。根据各重点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确定各片区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发展重点，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等，支持全产业链发展，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农特产品品牌，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产业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当地农村贫困人口的早日脱贫致富。

（五）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能够辐射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的骨干铁路、国家高速公路、水利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破解区域发展瓶颈，发挥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对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支撑作用。将重大基础设施，包括水利工程、流域开发与治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矿山地质恢复等工程建设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通过工程建设促进扶贫。

（六）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推进贫困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幅提高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包括：大力推进实施教育富民、教育移民、教育惠民工程，实现教育扶贫；

加强在贫困地区科技推广，促进创业，推进科技扶贫；加快建设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

四、进一步创新完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

（一）创新完善扶贫开发管理及绩效考核机制

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一是继续细化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理清各级政府职责，明确其各自事和权，提升各级扶贫政府机构的执行力，确保扶贫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二是加强机构建设，建议将在中央层面建立独立的扶贫机构，列入国家行政机构系列，负责贫困地区的连片开发、分散型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和指导社会扶贫慈善公益组织的业务；在地方上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扶贫开发机构，理顺扶贫工作机制，增强扶贫开发机构的资源协调能力，推进扶贫工作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改革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改革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一是贫困县短期减贫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关系；二是处理好贫困县里面贫困人群和非贫困人群利益的关系；三是对贫困县考核的指标和权重如何处理好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考核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晋升考核管理体制下，绩效考核是领导干部在地区间流动和职务提升的一个依据，原来以GDP为中心的考核办法要根据贫困地区的条件和任务来确定考核指标和权重，以鼓励和调动有能力、有志向的干部到贫困地区开创扶贫工作。按照“滴灌”模式扶贫，加快建立健全贫困县考核、约束和退出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组织考核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贫困县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大扶贫开发工作权重，对扶贫开发中做出实绩的干部要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要制定贫困县扶贫攻坚和行业部门开发考核办法，按照办法对县和行业部门进行监督检查，进行考核。

（二）加快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

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机制。一是要认真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管理机制，党政主要领导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的责任制，合力分工，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落实的责任制。二是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构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和精准管理的“四个精准”工作机制。三是推行简政放权，要推进实施“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扶贫机制，充分发挥扶贫对象及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精准扶贫识别与动态监测体系。制定具体化、明晰化、公开化贫困识别标准。在国家农村扶贫识别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县、本乡（镇）、本村实际，制定科学合理、操作性强、具体量化、动态的贫困户识别标准。所有参与扶贫信息采集程序公正化、标准化、规范化和透明化，以此保障扶贫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精准性。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结合目前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整合各方面的扶贫动态数据，包括扶贫主体、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等数据，加快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扶贫特征变化、扶贫效果、扶贫趋势等，为精准扶

贫的政策制定、管理方式、扶贫重点、举措等提供依据，进一步巩固建档立卡成果，实施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在扶贫方式、扶贫资源和扶贫考核上实现精准化。

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贫举措。一是在区域层面加大贫困地区生产性、设施性建设项目精准投资；二是在县域和村镇层面，加大产业扶贫项目的统筹协调与精准指导，支持贫困地区龙头企业的发展；三是在个体层面，加大对重点贫困户精准扶贫和社会扶贫力度，通过以工代赈和救助兜底帮助一批贫困人口。

（三）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扶贫新机制

创新“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坚持和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三位一体”，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工作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创新社会扶贫方式、拓展社会扶贫领域、强化社会扶贫地位。

明确社会扶贫的主体关系。“十三五”时期，应坚持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动员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部门、政府关联组织机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推进的扶贫开发格局。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导，社会力量为主体广泛参与扶贫事业的扶贫工作格局。

创新社会扶贫机制。一是完善社会参与扶贫的平台建设，积极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扶贫工作之中；二是明确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渠道，建立起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途径参与扶贫的渠道；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扶贫的制度保障，保障参与

主体的合法权益及监督权利；四是加强社会参与扶贫的组织机构管理，完善社会扶贫主体内部的合作机制；五是建立和完善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六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扶贫的考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方面的机制建设，实现社会扶贫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创新和完善社会扶贫资源整合机制。一是整合社会扶贫机构。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各种扶贫机构资源，积极引导城乡、社会各界多方力量参与农村的扶贫开发与建设，建立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机构参与的整合、协调、管理机制。二是构建各类要素整合机制。要整合项目资金资源，把住房改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扶贫项目和资金，打捆使用，做到分工合理、形成合力、高效利用。三是构建市场化的扶贫机制。发挥政府财政扶贫的引领和“撬动”作用，带动市场扶贫。

（四）创新和完善扶贫开发投融资机制

创新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管理机制。一是实施扶贫资金分类使用和管理。对不同致贫原因的农户采用不同的扶贫措施，如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用入股企业获得分红的形式得到保障，因病致贫的农户采用卫生、医疗扶贫等方式让其在患病期间达到正常生活水平，家里有老人的贫困农户需要养老保险和信贷支持。二是建立完善的要素与竞争相结合扶贫资金分配方式。积极探索重大扶贫专项、以奖代补等扶贫资金实行要素分配与竞争分配的有机结合的分配方式，在保证要素法分配资金占总资金 50%以上的基础 上，将产业扶贫和以奖代补等先建后补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以提高扶贫资金的

使用效率。

创新地方扶贫融资平台。可在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市、县(区)扶贫开发投资公司试点，建立融资平台、担保平台、管理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引进各方力量，加大政、银、企合作，建立社会化融资扶贫开发新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农户”的融资体系。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逐步在贫困地区推广，解决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整合相关扶贫专项资金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作用，撬动金融信贷资金，吸纳民间资金，破解融资瓶颈。

创新扶贫投融资新模式。探索建立多种产业链融资模式，撬动企业资金和民间资金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建设领域。如“银行+融资平台+企业+农户”模式、“银行+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扶贫项目+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扶贫互助社+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等。

探索建立资产扶贫机制。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村将集体资产、贫困户将承包土地和个人财产入股，采取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确保贫困村和贫困户多渠道增收；探索投资收益扶贫模式，将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量化给贫困户，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到村或农民合作社形成的资产划出一部分，采取优先股的方式量化到贫困户，实行贫困户收益保底、按股分红；探索理财收益扶贫模式，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将无指定用途的扶贫捐资或安排到户的扶贫资金，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帮助其获得理财收益、分红收入。

（五）构建统筹城乡资源的一体化扶贫开发机制

统筹城乡人力资源要素，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推动城乡培训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劳动力素质，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增强贫困人口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统筹城乡扶贫资源，提高扶贫资源使用效率。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多予少取”的基本方针，推进实施各项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引导城镇扶贫资源向贫困农村的高效转移和使用。

统筹城乡公共资源，保障扶贫人口公共服务。构建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在内的各项救助措施，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

（六）构建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的扶贫开发机制

加快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融合扶贫机制。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发展特点和优势，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对国家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贫困地区的配套资金，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树立生态型扶贫理念，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在扶贫开发中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倡导生态循环经济新模式，走“低投入与高产出、低能耗与高效益、低排放与高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增长与生态恶化、环境破坏与贫困加剧的矛盾。

五、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政策支持力度

（一）建立健全扶贫开发的法律制度

扶贫法律制度薄弱和存在缺失，应在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国家反贫困法”或“中国扶贫法”，通过法律刚性约束规范政府和社会各界扶贫开发行为，使扶贫开发治理走上法制轨道。通过法律明确贫困主体，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类机构等扶贫主体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组织管理、资金使用、监督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二）加大财政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采用多样化财政支持方式。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改进扶贫资金管理方式，从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上破题，建立新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要通过把财政直接补贴的项目资金更多转变为政策性贴息、担保资金和风险补偿基金的方式，撬动金融资金投放；强化覆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便利化特惠财政政策措施；将农村危房改造、生态保护等方面资金与专项资金整合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支持农村发展资金互助合作，实施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推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模式。

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贫困地区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各有关方面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继续向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重点支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扶贫开发等领域建设。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公益项目中央投资的支持力度，提高补助标准。金融机构要优先安排扶贫开发示范项目的优惠贷款，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支持贫困地区加快脱贫致富。鼓励和引导中央企业和社会资

本投入贫困地区发展建设，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以动员全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扶贫开发事业。

（三）加大金融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引导多种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推行定向精准滴灌的普惠式扶贫金融；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用于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实施设立扶贫优惠贷款政策，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力度。在省级层面协调增加对支农信贷规模，建立农村动产(如营用车辆)、固定资产(如宅基地、房产)、联户(3户以上)及诚信担保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担保机制，取消农民贷款5万元以上必须要国家正式职工担保制度，降低农民贷款门槛，并将贷款期限从1年延长至3年，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不超过40%，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民发展致富产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科技对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培训工作，推进智力扶贫。扶贫先扶智，建立少年儿童接受教育、青壮年通过培训提高多渠道就业能力的扎实通道，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训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技术水平、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依托贫困地区农技推广系统力量，通过举办培训班，签署科技合作协议，组织专家咨询等，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推

广运用，促进产业化发展。使贫困地区的从业人员至少掌握一门适用的生产技能，增强自身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潜能。

加强在贫困地区科技推广，推进科技扶贫。农村贫困地区主要从事农林牧业生产，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要组织和发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力量，发挥科技扶贫优势和贫困地区对口部门研究培育推广适合当地发展的优良农林牧业良种。推广先进的种养植技术，普及效益好的种养殖项目，增加贫困农村人口的收入。

（五）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组织保障

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监管、贫困县考核、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攻坚重大事项推进行动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国家贫困县退出机制，搭建定点扶贫、对口扶贫、集团扶贫、企业扶贫等社会参与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引导各类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便捷通道，建立社会扶贫网络“直通车”，实现援助人与求助人点对点精准帮扶。

（六）加强扶贫开发国际交流与合作

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援助性扶贫项目。适当增加配套资金比例，对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可以全额配套。要根据贫困地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外援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还贷能力。

通过多种渠道、不同方式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扶贫开发的帮助和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借鉴国

际社会在扶贫开发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整体效益。

[成果摘要]

《研究报告》2015年第61期 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国企纷纷加快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进度，但有些国企改革在操作中偏离了中央改革的初衷，为了准确把握国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正确方向，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并提高其活力和竞争力，需要从战略层面加快完善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研究报告》2015年第63期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摘要】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评价方法，既是联合国千年目标之后新愿景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五大主题：社会福利指标主

要反映生活质量；资源与环境指标着眼于坚守生态红线，主要描述当前自然界所处的状态；人类影响指标主要反映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与生产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可持续治理是实现人类对自然正影响的主要手段；经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研究报告》2015年第64期

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数据验证结果及其分析

【摘要】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数据验证结果显示，中国可持续发展状况稳步得到改善，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经济社会活动的负面影响依然较大，可持续治理领域尚面临许多难啃的“骨头”，中国经济发

展正在遭遇结构调整的阵痛。

《研究报告》2015年第65期

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的基本框架与具体指标

【摘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代表的传统指标评价体系存在诸多缺陷，难以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新要求。把中国经济升级版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指标来进行测度、评估和指导，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开发的这一评价指数，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等特点，设计了六大类一级指标：市场活力指标、创新驱动指标、结构优化指标、两化融合指标、民生改善指标、绿色发展指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

《研究报告》2015年第66期

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的实证检验与政策建议

【摘要】根据中国经济升级版评价指数的实证检验结果，有以下几点结论：从趋势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升级的上升趋势；从升级的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升级的前期阶段；从升级的质量来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在结构还有待优化。为此，提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六点建议：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释放改革红利；加强供给侧管理，激发内需的巨大潜力；完善创新机制，形成内生发展的强大动力；实行积极的开放战略，形成促进改革的推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推动经济发展惠及广大人民。

《研究报告》2015年第67期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摘要】推进军民融合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应加强国家层面军民融

合的统筹协调，统筹衔接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健全和完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军工开放，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领域。推进军民互动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国家各种创新资源，逐步形成数量广泛、布局合理、跨地区跨行业的军民融合发展创新链。力争在“十三五”末，基本实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国防产业与民用产业的全面互通、互动和互补。

《研究报告》2015年第68期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分析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之一

【摘要】我国于1999年底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较城镇程度高，东中部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不明显，但各省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主要集中在60至80岁之间，老年人口中女性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城镇优于农村。我国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显著、城乡和区域不均衡、波动幅度大、未富先老的特点。应对人口老龄化存在六方面突出问题：养老保障制度亟待调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养老保障资金准备不足，养老服务机构发展不平衡，养老机构专业人员缺乏，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充分。

《研究报告》2015年第69期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两大战略和六项措施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之二

【摘要】“十三五”期间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采取两大战略：改善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用科技推动经济发展；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提高购买力，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建议采取六项配套措施：技术进步与人文进步并重，以创新升级促进健康长寿；经济速度与经济质量并重，创新发展观推动健康长寿；就业开源与福祉改善并重，二元养老金保障健康长寿；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并重，以社会企业服务健康长寿；家庭生育与国家人口规划并重，计划生育支持健康长寿；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并重，实现家庭幸福健康长寿。

《研究报告》2015年第70期

调整优化技术创新结构增强制造业整体科技实力

【摘要】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世界级制造业产业集群。健全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国家五大类科技计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共享机制。加强制造业共性（关键、基础）技术研发，逐步形成分布式、网络式

的前沿技术、基础性技术、共性（关键、基础）技术研发体系，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增进产业国际话语权。

《研究报告》2015年第71期

调整优化国防科工结构推进军民全面发展

【摘要】“十三五”时期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必须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加强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深化调整管理体制。以军用技术转移与合作为重点，加快军转民步伐。有序放宽军工行业准入门槛，统筹军民两用科研生产基础设施布局，明确资源开放共享重点领域，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制造业与武器装备发展、能力建设的规划衔接，大力发展军民结合产业。国防科技工业要把发展武器装备作为根本使命，同时，大力发展战略高技术产业，推进核能、航天、飞机、船舶、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

《研究报告》2015年第72期

甘黔桂金融扶贫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甘黔桂三省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发展、贫困户生产、村级资金互助和贫困家庭助学等六大金融扶贫领域积累了专业性经验，还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积累了金融扶贫综合性经验，树立了样板。推广其经验，有利于实现扶贫攻坚目标。

《研究报告》2015年第73期

建设“五位一体”多层次扶贫金融体系

【摘要】在金融扶贫领域，我国还存在五方面问题：县域扶贫金融
机构数量少、能力弱，存款外流严重；扶贫金融支持政策规范性、
梯度性不够，引导力不强；金融产品与贫困农户需求不适应；金融
监管制度不适应扶贫金融发展要求；扶贫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
展滞后。为有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我国应推动多层次、
多类型的扶贫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构建梯次、规范、协调的扶资金
融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新扶贫金融技术和产
品；完善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双层金融监管体系；配套建设扶贫
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报告》2015年第74期

国际军品贸易发展态势分析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展与深化，国际军品贸易作为国家政
治军事经济活动的对外延伸与拓展，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中的重要因素，对国际战略格局与地区形势产生着重要影响。近
年来，全球军品交易额稳步上升，特别是美俄等军事大国军品出口
不断增加，亚太、中东等热点地区军品进口急剧升温，反映出全球

安全尤其是地缘政治安全的动荡与隐忧。国际社会亟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管制制度与手段，把国际军品交易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国际交流]

11月25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中心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国际组织政策分析与发展中心副主任沙摩西先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维特先生、二等秘书达马斯特先生、三等秘书努格罗荷先生等4人一行，经济研究部黄永富研究员和信息部张影强博士陪同。